

白话唐李问对

阚耀珊

编著

时事出版社

白话唐李问对

阙耀珊 著

时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话唐李问对/阚耀珊著. —北京:时事出版社,
1997

ISBN 7-80009-448-0

I. 白… I. 阚… III.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-译文 IV. E892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814 号

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: 100081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昌平东旭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9.25 字数: 200 千字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 定价: 14.00 元

目 录

前言	(1)
卷上	(20)
卷中	(130)
卷下	(214)

前言

《唐李问对》，全称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，又称《李靖问对》、《李卫公问对》，或简称《问对》，宋朝元丰年间被钦定为《武经七书》之一，立于官学。此书以其丰富的内容，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军事史料价值，以及生动活泼的表达形式，深受阅者喜爱，因此自宋代以来经久留传，成了我国古代兵书百花园中一支常开不败的奇葩。世传此书为唐朝著名军事家李靖所撰。但从宋朝开始即对此书作者一直存在争议。下面将《唐李问对》有关问题作些简要介绍。

一、关于李世民和李靖

因为本书涉及唐太宗李世民和唐卫国公李靖，故先将这两个人的生平作些介绍。

李世民，唐高祖李渊的次子，唐朝第二代皇帝、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。祖籍陇西成纪（今甘肃省秦安），生于公元599年，卒于公元649年。自幼熟读兵书，刻苦习武。隋大业十一年（公元615年），突厥军围隋炀帝于雁门（今山西省代县），炀帝诏告四方，募兵赴援。时年16岁的李世民应征从

军，随屯卫将军云定兴前往救援。他建议拉长队伍、广布旗鼓以为疑兵之计，云定兴依计而行，使突厥军解围而去。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，各地豪强军阀乘势割据州郡。时李渊为太原（今属山西省）留守，在李世民的积极鼓动下，于隋大业十三年（公元617年）在太原起兵反隋，李世民率军夺取西河（今山西省临汾），获得首战胜利。八月，李渊进军关中。但到霍邑附近时，逢连阴雨，粮草几绝，李渊欲还兵太原，李世民苦谏，始坚定李渊进军决心。霍邑之战，李世民大败隋宋老生军，遂挥军西进，占领长安。李渊称帝后，李世民任尚书令，封秦王。唐武德元年（公元618年），陇西薛举、薛仁杲父子率兵进犯关中，威胁长安。李世民引兵迎击，在浅水原（今陕西省长武），一举歼灭薛军10余万，夺取了陇西。武德二年（公元619年），依附突厥的刘武周夺占太原，南下河东，威胁长安。李世民主动请战，针对来犯的刘军宋金刚部孤军深入、军粮不继的弱点，采取待机破敌的方针，先屯于柏壁（今山西省新绛）不出，待宋金刚部粮尽而退时，率军猛追，歼致于介休（今属山西省），进而收复太原。武德三年（公元620年）七月，李世民奉命率军东击在洛阳称帝的隋朝将领王世充，于次年二月将王世充军围困于洛阳孤城之中。河北的窦建德领兵10余万来救洛阳。李世民分兵以一部继续围洛阳，并亲率精锐部队控制虎牢（今河南省荥阳汜水镇），相持月余，窦军数战不利，将士思归。李世民寻机突袭，生擒窦建德，再回军洛阳，迫使王世充投降。武德四年（公元621年）七月，窦建德部将刘黑闥重举义旗，攻城略地，很快占据窦建德原在河北的地盘。次年正月，李世民奉命率军出关东进，三月在洺州（今河北省永年）大败刘黑闥军。武

德七年（公元624年）八月，东突厥颉利、突利二可汗率军南下，大有直取长安之势。唐军大惊，李世民亲率百骑至阵前，用反间计使二可汗请和而退。武德八年（公元625年），李世民进位中书令。因李世民功高，李渊几次许其为太子。太子李建成怕被废除，与齐王李元吉密谋杀害李世民，计议泄露，李世民于武德九年（公元626年）六月发动“玄武门之变”，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，被定为太子，并于八月继帝位，改元贞观。不久，颉利可汗兵临长安，李世民亲至渭水便桥与颉利可汗结城下之盟，使突厥退兵。贞观三年（公元629年）冬，突厥进犯河西走廊。李世民命李靖、李勣等率军分道出击，于次年二月大败突厥军，俘颉利可汗，东突厥遂亡。贞观九年至二十二年，李世民或遣使或出兵，经略西域，使吐谷浑、高昌、焉耆、龟兹等国与唐结好。晚年曾发动对高丽的战争。除武功之外，李世民在位期间，推行均田制、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度，并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核。又修《氏族志》，发展科举制度。他常“以亡隋为戒”，较能任贤纳谏。当时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，被史家誉为“贞观之治”。

李靖，字药师，唐代著名军事家。京兆三原（今属陕西省）人，生于公元571年，卒于公元649年。少时熟读孙、吴兵法，深受其舅父、隋朝大将韩擒虎的赏识。隋末曾任马邑（今山西省朔县）郡丞，后被李世民召入幕府，随从作战，因功授开府仪同三司。武德二年（公元619年），李靖奉命讨南方割据势力萧铣，率兵至峡州（今湖北省宜昌）受阻，险被李渊处死。后李靖向李渊献“平铣十策”。武德四年（公元621年），李渊诏拜李靖为行军总管兼摄赵郡王李孝恭部的行军长史，举兵伐萧铣。李靖率军直捣江陵（今属湖北省），迫使萧

铎投降，并南下抚慰岭表，长江中游及岭南地区遂为唐所有。武德六年（公元623年），杜伏威余部辅公祐据丹阳（今江苏省南京）反唐，李靖奉命协助李孝恭前往镇压。次年二月，辅部水陆精锐5万人据当涂（今属安徽省）有利地形，筑城栅防守。李靖出其不意，先以主力破辅部水军，又乘势率轻兵直趋丹阳，擒获辅公祐，遂平定江淮。贞观三年（公元629年），李靖奉命与李勣配合，进袭东突厥。次年正月，李靖率3000人从马邑奔袭定襄（治所在今山西省平鲁县西北），颉利可汗先后遁逃磧口（今内蒙古自治区善丁呼尔）、铁山（今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附近）；二月，李靖率军消灭东突厥主力，颉利可汗被俘，东突厥遂灭。贞观八年（公元634年），李靖以足疾上表辞官，得唐太宗称许。不久，吐谷浑扰唐。唐太宗有意起用年愈花甲的李靖挂帅征讨吐谷浑。李靖欣然应命，率军分两路深入西域，大战数十次，于次年取得胜利。李靖历任上柱国、岭南道抚慰大使、安州大都督、灵州道行军总管、刑部尚书、检校中书令、兵部尚书、代州道行军总管、定襄道行军总管、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等职，封卫国公。李靖晚年辞官后闭门谢客，然而唐太宗仍常向其征询军国大事。据《新唐书·李靖传》记载，唐太宗晚年想征高丽，召见李靖说：“公南平吴，北破突厥，西定吐谷浑，惟高丽未服，还有意去吗？”李靖说：“任凭天威，得效力建尺寸功。今疾虽衰，陛下诚能不弃，病即将痊愈。”唐太宗哀怜其老，不许。李靖年近半百时归唐，十六年中四度统军征战，均获全胜。他的著作，据《新(旧)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有《六军镜》三卷，原书已佚，只在杜佑所著《通典》中保存一部分内容。清朝汪宗沂从《通典》等书中辑成《卫公兵法辑本》凡三卷，刊行于世。

二、关于《唐李问对》的作者

有关《唐李问对》的作者问题，也就是此书的真伪问题，从宋朝以来就有争论，至今也没有定论。大体有三种说法：一说此书的作者是宋朝人阮逸（注）；一说肯定作者不是李靖，但也不一定是阮逸，可能是宋朝某人；一说作者就是李靖。下边分别介绍这些说法的根据。

对《唐李问对》的真伪问题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宋朝大名鼎鼎的武经博士何去非。据他的儿子何蒞在《春渚纪闻》中记载：何去非在任武经博士时，奉命校正《武经七书》。他怀疑《六韬》和《问对》为伪托之作，并把这个意思报告给当时的武学负责人朱服。朱服回答说：此书行之已久，未易遽废。后来，何去非任武学教授时，又与陈师道谈了他对《问对》真伪的怀疑。陈师道说，他听苏东坡说，李靖《问对》是阮逸所撰。阮逸曾把草稿拿给苏洵（苏东坡之父）看过。何蒞的师长陈师道在《后山谈丛》中说：“世传王氏《元经》、薛氏《传》、关子明《易传》、李卫公《问对》，皆阮逸所著。逸以草示苏明允（即苏洵），而子瞻言之。”此后，一些学者认同陈师道、何蒞的说法。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·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题解》、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、邵博《闻见后录》、汪宗沂《卫公兵法辑本自序》、湘浦《卫民捷录·问对题注》等，都认为《问对》为阮逸所撰。

也有人认为《问对》的作者就是李靖。宋末元初人马端临在《文献通考》中说：“按《四朝国史·兵志》，神宗诏枢密院曰：‘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，杂见《通典》，离析讹舛。又

官名、物名于今称谓不同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。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、曾皎、王白、郭逢原等校正，分类解释，令今可行。’岂即此《问对》三卷邪？或别有其书也。然晁陈二家以为阮逸取《通典》所载附益之，则似即此书。然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，既明见于国史，则非逸之假托也。”宋神宗说要枢密院校正的是《李靖兵法》，不是《问对》，这是明白如水的。如果看一下汪宗沂从《通典》等书上辑录的《卫公兵法辑本》，就会清楚，《问对》既与《李靖兵法》不是同一部书，也不是“取《通典》所载附益”而成的书。马端临的“似即此书”、“即见国史则非逸之假托”的论断，在逻辑上显然是不妥当的。此后，也有人认同“既见国史”论，没有提出证据来说明《问对》的作者是李靖。

几乎可以肯定，《问对》不是李靖所撰，主要根据是：

（一）新、旧《唐书·艺文志》都只著录《李靖六军镜》而未著录《问对》。《旧唐书》为后晋刘昫监修，成书于公元940—945年；《新唐书》为欧阳修、宋祁所撰，成书于公元1044—1060年。足见在公元1060年以前，确无《问对》一书传世。不能设想《问对》已传世而欧阳修不予著录，或将其著录为《六军镜》。

（二）唐朝杜佑所撰《通典》大量引用“李靖兵法”原文，而未见摘录《问对》之语。可见唐朝确无此书。宋初编纂的《太平御览》和《武经总要》，从《通典》中摘录李靖的话，也未见有《问对》中的话。《武经总要》成书于1044年。可见在此之前尚无《问对》一书。

（三）宋神宗下诏枢密院说：“唐李靖兵法，世无全书……”。下诏时间在宁熙八年（公元1075年）。可见《问对》

在此之前并不流行。否则，有完整的“李靖兵法”《问对》传世，宋神宗何以下诏说“世无全书”呢？

（四）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李靖兵法竟有七部之多，计有：《阴符机》一卷，《韬铃秘术》一卷，《弓诀》一卷，《卫国公手记》一卷，《六军镜》三卷，《兵铃新书》一卷，《韬铃总要》三卷。李靖是唐初人。新、旧《唐书》均说他只有《六军镜》三卷。可是在他死了几百年之后，元朝的脱脱、阿鲁图等于公元1343年—1345年撰写《宋史》时，竟在他的名下著录兵书七部之多。可见，在宋神宗下诏之后，为了邀功而伪托李靖写书的宋人不少。《宋史》仓促成书，错讹颇多，是众所周知的。

（五）《问对》卷上：“太宗曰：‘黄帝兵法，世传《握奇文》……’。”《握奇文》（或称《握机经》）是唐李筌伪托，几成定论。唐太宗死的时候，李筌尚未出世（筌生卒年不详，但约为唐玄宗至唐代宗间即公元713年—779年间人）。他怎么能看到《握奇文》呢？此外，《问对》卷中所讲设瑶池都督之事发生在贞观二十三年（公元649年）二月，此后不多日子李靖就去世了。当时他年老（79岁）多病，在家闭门谢客。唐太宗一般不会因这点事去打扰他。所以这一节的情节也不太可信。

《问对》不是李靖所撰，是否就一定就是阮逸所写呢？也有些疑问。首先，孙师道、何筌提供的都是间接的证据，不是直接的证据。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在《晦庵集》第三十卷批评陈师道的《后山谈丛》多有“得有一时传闻之误者”。其次，苏洵死于公元1066年。如果苏洵看过阮逸写的《问对》草稿，此书应写成于1066年之前，何以到1075年宋神宗下诏之前

仍不流行呢！

《武经七书》是元丰三年（公元1080年），由宋神宗下诏刻印刊行的。从1075年《问对》不流行，到1080年《问对》成了武学经典，这件事真有些蹊跷。但《问对》成书于北宋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还有一种既否定《问对》为李靖所撰、又否定其为阮逸所托的议论。如明代的胡应麟在《四部正伪》中说：“《李卫公问对》，其词旨浅陋猥俗，兵家最无足采者，而宋人以列《七书》，殊可笑……此书不特非卫公，亦非阮逸，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、杜佑《通典》原文，傅以闻见以耳口。武人不知书，悦其俚近，故多读之。”这种议论充满了偏见，而且与事实不符。《问对》根本没有“缀拾”杜佑《通典》原文，前边已有论述。

还有一种认识，说《问对》“即使不是李靖的手定稿，也当是精通兵法韬略、握有唐太宗与李靖论兵言论材料的隐士汇编而成，其成书时间下限应在五代（见《中国古代八大兵书·李靖兵法·评说与应用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6年2月版）。其根据是：（一）《问对》谈的都是唐贞观及以前的事情；（二）《武经七书》成书于宋元丰三年（公元1080年），不可能把几乎同时代的阮逸的伪作列为皇帝钦定的武学经典；（三）北宋时已有人给《问对》作注，朱服就《武经七书》校定问题所上奏章也说《七书》均曾有注本。以上说法不无道理。但既然是五代时人汇编而成，且早有注本，何以新、旧《唐书》不加著录呢？难以解释。

以上介绍了对《问对》作者的各种看法及其根据。笔者的看法倾向于《问对》是北宋人所撰，但不一定就是阮逸。

三、关于《问对》的学术价值

一本书有没有价值，是由其内容决定的，而并非是由其作者的名字决定的。“辨伪”只是为了查清书的真实作者、成书年代，当然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书的时代特征和局限性。但“辨伪”不等于“书评”。对书的价值，只有通过“书评”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

《唐李问对》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共计有 1.03 万余字，有 98 个问题，每一问答都有相对的独立性，论题广泛，内容十分丰富。北宋具体负责《武经七书》校定工作的枢密院察详官王震、国子监司业朱服等，从当时搜集到的 347 部、1950 卷兵书中，选定《唐李问对》作为《七书》之一，可见这部书是较为出类拔萃的，是有重要价值的。后人对《唐李问对》的价值也有确评。如南宋戴少望在《将鉴论断》中评论此书说：“兴废得失，事宜情实，兵家术法，灿然毕举，皆可垂范将来。”清人俞正燮在《癸巳存稿》中说此书“语权审详，真大将言也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则说：“其书分别奇正，指画攻守，变易主客，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。”当然，也有否定《唐李问对》的价值的。如胡应麟就以此书“词旨浅陋猥俗”为据，认为它是“兵家最无足采者”。这种不作具体分析，近似谩骂式的“评论”是不足为训的。

《唐李问对》讨论的军事问题比较广泛，有军事思想、作战方法、作战方式、作战指挥、军事训练、阵形阵法、治军原则、任将用人、兵法源流、体制编制，等等。其中，讨论最多的是作战的问题，其次是训练和阵法。讨论中，有不少

独到的见解，当然也有一些不尽妥当之处。下面扼要作些评介：

（一）有关“奇正”的论述，有新发展

《孙子兵法·势篇》说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”又说：“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哉。”这是有关“奇正”问题的最早的、最权威的论述。其后许多兵家对“奇正”问题进行过探讨。《唐李问对》用8节的篇幅、提出了13个问题，对“奇正”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，有些见解超过了前人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（1）对“奇正”含义作了新的解释。一般认为，“奇正”包括作战部署、作战方法两个方面。在部署上，以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为正，以担任机动支援任务的部队为奇；以担任牵制任务的部队为正，以担任突击任务的部队为奇。在战法上，以正面进攻为正，以迂回侧击为奇；以明攻为正，以暗袭为奇；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，按特殊情况采取特殊方法作战为奇，等等。《唐李问对》提出“非正兵安能致远”的问题，实际是讲向战场机动也有个“奇正”的问题，即按正常秩序开进为正，向战区奔驰跃进为奇；以携辎重开进为正，以轻装开进为奇。如是，数千里行军，非正兵不可。（2）把“奇正之变”、“奇正相生”与“形敌”、“虚实”、“分合”等联系起来，使抽象的“之变”和“相生”等概念具体化、深刻化。《孙子兵法》提出了“奇正之变”、“奇正相生”的正确命题，但未作具体阐述。《唐李问对》的论述深入了一步：首先，认为奇正变化必须创造一定的条件，那就是“形敌”、“多方以误之”，“以奇示敌，非吾正也”，“以

正击敌，非吾奇也”，“以奇为正者，敌意其奇，则吾正击之，以正为奇者，敌意其正，则吾奇击之”；其次，认为奇正变化必须针对敌方虚实情况，“奇正者，所以制敌之虚实也。敌实，则我必以正；敌虚，则我必为奇”，因此，“识虚势之势”，“使敌势常虚，我势常实”，才能灵活运用“奇正相变之术”；再次，认为奇正变化产生于部队分合变化之中，“兵有分有聚，各贵适宜”，“分合所出”，奇正为变，“善用兵者，无不正，无不奇，使敌莫测，故正亦胜，奇亦胜”。（3）强调了奇正变化的两个关键因素是“有能之将”和“有制之兵”。作者把将领分为三种：“正而无奇，则守将也（保守的将领）；奇而无正，则斗将也（冒险的将领）；奇正皆得，国之辅也（智勇双全的将领）。”“有能之将”是“奇正皆得”之将，能够“临阵出奇，攻人不意”。如果将领只知“以奇为奇，以正为正”，怎么能使奇正相变呢！“有制之兵”就是经过训练的、懂得“奇正相变”之法的士卒。这样的士卒就能“由将所指”“如驱群羊”，“止知其胜，莫知其所以胜”。

（二）有关“攻守”的论述，有些新意

《孙子兵法》有关“攻守”的论述比较多，但核心论点是以下两句：“不可胜者守也，可胜者攻也。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。”意思是：不可被敌战胜，是因为做好了防守的准备；可以战胜敌人，是因为具备了进攻的条件。防守，是由于力量不足；进攻，是由于力量有余。《唐李问对》对“攻守”的论述，内容更加丰富。首先，对《孙子兵法》中所说的“不足”、“有余”作了新的解释。说有人将“不足”解释为“弱”，将“有余”解释为“强”，这是“不悟攻守之法”。又

说“敌未可胜，则我且自守，待敌可胜，则攻之尔，非以强弱为辞也。”这样的解释可能有些片面，但也不无道理，且有新意。其次，将“攻心”、“守气”列入“攻守”的内容。认为：“夫攻者，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，必有攻其心之术焉。守者，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，必也守吾气而有待也。”指出军心士气在“攻守”中的重要作用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又说：“夫攻其心者，所谓知彼者也，守吾气者，所谓知己者也。”把“攻心”、“守气”与“知彼”、“知己”联系起来，这又深化了“攻守”的内容。第三，提出“攻守一法”，阐述了两者的辩证统一的关系。说：“攻守一法，敌与我分而为二事。若我事得，则敌事败；敌事得，则我事败。得失成败，彼我之事分焉。攻守者一而已，得一者百战百胜。”就是说，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，都是致胜之法，掌握了这种致胜之法，就能百战百胜。攻守的辩证关系是什么呢？作者认为：“攻是守之机，守是攻之策，同归乎胜而已矣。”即：进攻是防守的转化，防守是进攻的手段，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获胜。并提出：“若攻不知守，守不知攻，不惟二其事，抑又二其官”，那是不会掌握攻守一法的道理的。“二其事”是说把攻守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，“二其官”是说把攻守的运用各自孤立起来，也就是不把“攻守”看成是辩证统一的，就不会掌握“攻守”的精神实质，更不能合理地运用这两种致胜的方法了。第四，提出了运用“攻守”之法时应特别注意的两个问题：一个是“诱敌”，即“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，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。示敌以不足，则敌必来攻，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；示敌以有余，则敌必自守，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”；另一个是“先为不可胜”，“以待敌之可胜”，也就是“知己”、“知彼”。

“攻守”之中的这两个问题，前一个问题的提法有一定片面性，后一个问题则是应当十分注意的。

（三）有关训练思想和方法的论述，比较实用

宋朝仁宗时，经过 60 余年的和平环境，武备松弛，军人不懂兵法战阵。元昊造反，宋军不能抵挡，屡吃败仗。这引起了朝廷对军事训练问题的重视，开始建立武学。到宋神宗时，还专门任命了武学负责人（国子监司业），选拔精通兵法的官吏任武学教授。也许是由于北宋比较重视军事训练，《唐李问对》中有关训练的章节也比较多（共 9 节），且其提出的训练思想、训练方法，也比较适合当时的情况，比较实用。一是提出了“教得其道”的训练思想。认为：“教得其道，则士乐为用；教不得法，虽朝督暮责，无益于事矣。”这是很有道理的。教育训练的问题，主导方面在教育者。教育者不讲求方法或“不得法”，学习者是不能得到或难以得到知识和技能的，“朝督暮责”对学习只起促进作用，不起决定作用。它还反对教育训练中的教条主义，认为“垂空言，徒记诵，无足取也”。这种教育训练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。二是主张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训练。对将领的教育，主要是“宣告”、“密教”，也就是讲解作战理论和战争实践的经验教训；对士卒的训练，则根据不同的兵种施行训练，如“车徒常教以正，骑队常教以奇”，“步教足法，兵教手法”等。三是提出比较合理的训练程序和方法。它提出训练程序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，是教“伍法”；第二阶段是由“军校”训练；第三阶段是由“裨将”按阵法对经过“军校”训练的士卒进行合练。最后由“大将”考察、检阅训练成果。这样的